

# 批评话语分析视角下国家文化形象的自我构建与他人构建

## ——以《浮生六记》两个英译本为例

王千慧

天津外国语大学

DOI:10.12238/pe.v3i5.16614

**[摘要]** 本研究从批评话语分析视角出发,选取《浮生六记》林语堂译本和雪莉·布莱克译本。基于Fairclough的三维框架理论,探究两个译本对中国国家文化形象的构建,研究内容从文本、话语实践、社会实践三个维度展开。研究表明,林译本构建出了一个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典雅含蓄、更加立体、多元丰富的中国国家文化形象;布译本构建的中国国家文化形象较为单一、扁平,体现了国家文化形象自我构建与他人构建的不同。

**[关键词]** 批评话语分析; 三维框架; 《浮生六记》; 国家文化形象

**中图分类号:** G09 **文献标识码:** A

### Self-construction and Other-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Cultural Im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 Case Study of Two English Versions of Fu Sheng Liu Ji

Qianhui Wang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selects Lin Yutang's and Shirley M. Black's English versions of Fu Sheng Liu Ji to explore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national cultural image based on Fairclough's three-dimensional framework. The research is conducted from three dimensions: text, discursive practice and social practice.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Lin's translation constructs a Chinese national cultural image that is rich in cultural connotation, elegant, more three-dimensional and diverse, whereas Black's translation presents a relatively singular and flat image of Chinese national culture, reflect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self-construction and other-construction of the national cultural image.

**[Key words]**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ree-Dimensional Analytic Framework; Fu Sheng Liu Ji; National Cultural Image

## 引言

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推进,中国文学作品不断受到世界的广泛关注。同时,国家文化形象的构建也越发重要,“国家文化形象”是“国家形象”的重要构成,能够体现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于平,2011)。中国文学走出去对国家文化形象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浮生六记》承载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但目前很少有研究基于批评话语分析的视角对《浮生六记》进行分析,同时现有研究也很少聚焦于其译本所体现的国家文化形象。此研究基于Fairclough三维框架对比研究《浮生六记》林语堂英译本和雪莉·布莱克英译本,分析中国国家文化形象的自我构建和他人构建,以期为中国国家文化形象

在典籍翻译与传播的过程中提供参考。

批评话语分析的目的不仅仅是描述语言现象,更是要揭示隐藏在语言背后的意识形态和权力运作。Fairclough提出的三维框架,即从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三个维度进行话语分析。文本维度聚焦文本本身的语言特征,如词汇选择、句式结构等;话语实践维度关注文本的生产、传播与消费过程;社会实践维度则分析话语与权力、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将从这三个维度展开,在文本层面对两个译本的词汇选择和内容呈现进行分析,话语实践层面因为研究主题和篇幅的限制,主要聚焦于语篇生产背后的社会背景以及语篇生产过程中采取的策略,社会实践层面聚焦于译本背后的权力差异和意识形态。

## 1 文本层面

### 1.1 词汇选择

词汇选择这一方面主要聚焦于林语堂和布莱克对于原文中出现的娼妓风气、裹脚恶习以及清朝学制的不同处理方法。

《浮生六记》写于清朝,清代娼妓之风盛行,文中出现了多处对娼妓的描写。古代娼妓行业也分门别类,林语堂并没有都将其翻译为“prostitute”,而是根据不同的人物身份和语境对其进行了不同处理,除去将个别指向性非常强的称谓翻译为了“prostitute”,其余的多数处理为“sing-song girl”或者“girl”,而在布莱克译本中,多数将其处理为了“prostitute”或者“courtesan”。

对于文中涉及裹小脚的内容,林语堂有意对其进行了规避,其在翻译“足极尖细”时,只将其翻译为“small feet”,布莱克则是译为“extremely small and tapering”,使得裹小脚的内涵一览无余。

整体来看,林语堂构建的中国国家文化形象更加正面积极。

原文中提及书院之时——“时正谊书院犹未启也”,林语堂选择将“书院”译为“College”,展示清朝的学制,但布莱克省去不译,这样更符合西方对东方的他者想象,削弱了我国深厚的文化底蕴。

### 1.2 内容呈现

就译文整体内容的呈现而言,林语堂的译本高度保留了原著内容,整体上遵循且还原了原文本;而布莱克译本在内容上做出了较大程度的删减。以下内容主要探讨布莱克译本在内容上的改动。

卷一《闺房记乐》中有一部分内容是沈复同芸探讨不同的古文风格和文体形式,其中涉及了多位古代大家,彰显了丰富的文化信息,展现了中国文化的多元性和深厚底蕴。布莱克将“《国策》《南华》取其灵快……在人之慧心领会耳”这一段全部删去,不仅削弱了原文本的思想深度,而且导致了中国国家文化形象在其译本中的弱化和单一化。原文本中丰富的文化内涵被简化,多元立体的文化形象被削弱。

卷二《闲情记趣》中沈复花费大量篇幅去描写瓶插花、盆栽花、园林植花的技巧和趣味,体现了其作为当时文人缩影的闲情雅致,展现了中国传统文人的生活情趣和审美观念,但这些都布莱克删减掉了,其背后蕴藏的世人精神也被削弱,译本体现的中国国家文化形象的深度和厚度也大打折扣。

卷四《浪游记快》主要以沈复的游历为线索,记述了他在各地的所见所闻、所历所感,耗费了大量笔墨,承载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布译本中这些内容几乎都被删除,对于自然美景、人文景观、园林建筑等描写全部被删减。中国国家文化形象失去了山水人文的立体支撑,极大削弱了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之林中的辨识度与独特性,导致中国文化形象在传播中被扁平化。

除此之外,布译本不仅删减了大幅能够体现中国文化的篇章,而且还增加了两首原文中并没有出现的古诗——杜甫的《秋兴八首·其一》和李白的《春夜洛城闻笛》。尤其是《秋兴八首·其一》的增加,布译本更是以芸的口吻说这是芸自己最喜欢的诗,但原文中根本没有提到过此内容,此处增译已脱离了原文本,是出于译者个人意愿增加的。这两首诗都属于羁旅诗,这两首古诗的增加将诗中的愁绪移植到芸娘身上,虚构其多愁善感的特质,进一步固化了西方视野中忧郁东方的刻板形象。

叙事手法上,布莱克将原文按照主题分类的叙事手法改为线性叙事,通过选择性删减与事件重组,将叙事重心聚焦于沈复和芸的爱情线,弱化了文人雅集、艺术品鉴等文化深度内容,中国文化形象从雅俗共融的复合体退化为东方爱情童话。而林语堂则保留原文笔记体小说体例,林译对笔记体小说的保留不仅是对当时中国独有的这一新文体的介绍与传播,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文学手段再现了原小说作者的人生观、爱情观和中国山水风景以及当时文人们极高的文学品位和审美能力(黎土旺,2007)。

## 2 话语实践层面

话语实践层面探索话语是如何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产生的,又是如何被传播和消费的。因为研究主题和篇幅的限制,此层面主要聚焦于语篇生产背后的社会背景以及语篇生产过程中采取的策略。

林译本出版于1935年,这一时期西方对中国文化存在着很大的偏见。林语堂作为这一时期的双语大师,肩负起了对外传播中国文化的任务,旨在挑战西方霸权话语中的中国形象,重塑中国文化尊严,其翻译策略与文本选择无不深刻烙印着这一时代印记。其在翻译过程中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保留和显化,主要使用了增译、直译、音译等策略;对于包含消极因素的内容进行了弱化和规避,主要使用了改译和减译的翻译策略,这一点从上述提到过的其对清朝娼妓风气的弱化以及对裹小脚这一恶习的有意规避可以看出。《浮生六记》反映的是清代封建社会的生活图景,不可避免地包含落后习俗。如果在翻译过程中不加甄别地全盘呈现,不对其进行合理的处理,那么可能会强化西方社会对中国固有的刻板印象,甚至为少数别有用心者提供曲解、丑化中国文化形象的依据,从而对作品的有效传播造成阻碍。

布莱克译本诞生于1960年,二战结束后西方文化仍属于强势文化,其译本明显体现出对弱势文化的改写和宰制。其译本抛弃原文笔记体小说的体裁,将其按照线性时间排序,并多次使用改译和增译的翻译方法去细化沈复和芸之间的情感和相处细节,使用减译的翻译方法大幅删减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情节。对于涉及爱情的典故,布莱克对其进行了大幅增译,在翻译“鸿案相庄”这一爱情典故时,她增译了将近200词对其进行阐述;在翻译“是年七夕”时,又增译了近100词去解释牛郎织女的故事。归

根结底是因为布莱克在翻译过程中是将《浮生六记》看作了一部纯粹的爱情小说。

原文: 芸回眸微笑, 便觉一缕情丝摇人魂魄。(沈复, 1980:3)

林译: Yun looked back at me with a smile and our souls were carried away in a mist of passion. (林语堂, 1999:13)

布译: Yuen's eyes smiled into mine, and in that moment our souls were closely bound with the silken strands of love; our quivering bodies knew the intensity of desire. (Black, 1960:9)

原文: 余虽恋其卧而德其正, 因亦随之早起。(沈复, 1980:3)

林译: Although I wanted her to lie in bed longer, I could not help admiring her virtue, and so got up myself, too, at the same time with her. (林语堂, 1999:15)

布译: I wanted to make love to her again; to told her in my arms a little longer; yet I had such respect for her strength of character that I made myself get out of bed as she did. (Black, 1960:9)

分析: 林译保留了原文含蓄的特点。“一缕情丝摇人魂魄”没有具体指向身体层面的渴望, 而是聚焦于精神层面的悸动, 符合中式传统文学中的克制与留白。布莱克增译了原文没有的“our quivering bodies knew the intensity of desire”, 原文未涉及任何身体层面的描写, 布译使原文含蓄内敛的感情变成了直白缠绵露骨的表达, 其译本的整体爱情叙事更为浓烈外显。“恋其卧”指“留恋芸娘睡在身边”, 布译“wanted to make love to her again; to hold her in my arms a little longer”, 把原文含蓄的眷恋陪伴具象化为强烈的身体亲密渴望, 塑造了符合西方读者对浪漫爱情认知的夫妻形象, 让沈复与芸娘的关系更贴近西方爱情叙事, 忽略了原文中所蕴含的文人式含蓄情感叙事, 赋予其更多符合西方现代爱情观的特质, 削弱了原文中更为内敛的夫妻相处之道。

根据以上例子, 可以看出布莱克在翻译过程中, 将东方更加含蓄内敛的情感表达方式改为直白强烈的情感表达。原文中沈复与芸娘的情感表达以含蓄蕴藉为特征, 而布莱克通过增译、改译来强化对话亲密度等手法, 使东方内敛的情感外显为西方式的“浪漫激情”。这种改写迎合了西方对“浪漫爱情”的期待, 却消解了原文朴素淡雅的情感美学, 使中国文化中“发乎情, 止乎礼”的伦理特质被简化为通俗言情叙事, 使得原文自传体的性质变得更像一本充斥着炽烈情感的西方爱情小说。

整体来看, 林语堂构建了一个文化底蕴深厚、典雅含蓄的中国国家文化形象, 而布莱克译本重点聚焦于两人之间爱情的描写, 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文化层面的深刻阐述, 从而构建出的中国国家文化形象较为单薄。

### 3 社会实践层面

社会实践层面从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对话语的影响和塑造进行分析。林译本于1935年在美国出版, 布译本在1960年出版。30年代后, 中国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发生质变。启蒙思潮变得更加激进, 再造中华、再造中华民族的思想成为主潮(王友贵, 2003)。同时, 林语堂个人的文化态度也发生着转变, 翻译此书之时其正处于肯定中国文化反思西方文化弊端的时期。加之此时西方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 这个时期的译者肩负起对外传播中国文化的使命, 致力向西方介绍一个富有魅力的中国文化形象, 打破其对中国的刻板印象。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林译本在中国国家文化形象的塑造上是更加积极、丰富饱满的, 其向西方展现了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国文化形象。布译本于1960年出版, 这一时代背景下, 西方文化在二战后凭借其政治、经济优势, 依然占据着全球文化的强势地位。西方意识形态中仍存在着“东方主义”的霸权话语, 中国文化处于被边缘化、被定义的弱势境地。这种深刻的不对称文化关系, 实则表现为一种定义与表征的权力差异。这种背景下, 布译本更偏向于用西方意识形态来阐释弱势文化, 对原文本进行符合本国意识形态的改写、删减、增译, 这体现在其东方主义的叙事视角上。作为身处强势文化体系的译者, 布莱克在解读和再现中国文化文本时, 最终将一个笔记体自传小说译为了一个纯粹的爱情小说, 其构建出的中国文化形象被简单化、扁平化。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意识形态、权力关系都在影响着话语的塑造。

### 4 结语

此研究基于Fairclough三维框架, 从文本层面、话语实践层面、社会实践层面对两个译本进行比较, 分析国家文化形象自我构建与他人构建的不同。从文本层面和话语实践层面来看, 林译本忠实原作, 注重文化元素的传播以及消极元素的规避, 布译本大幅删减涉及文化的篇幅, 并强化情爱描写, 将原作简化为一个符合西方浪漫想象的爱情小说, 忽视了原文丰富的文化底蕴与精神; 社会实践层面, 由于强弱文化背后蕴藏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差异, 导致布译本更加迎合西方对于东方的他者想象, 而林译本则更加注重中国多元文化的传播。综合来看, 林译本对于中国国家文化形象的自我构建更加立体、全面, 呈现出了一个更加丰富饱满、文化底蕴深厚、含蓄典雅、积极正面的中国国家文化形象; 布译本对于中国国家文化形象的构建相对来说较为扁平化、单一化, 更加迎合西方对于中国的他者想象。

#### [项目课题]

本文系2024年天津外国语大学科研课题“批评话语分析视角下国家文化形象的自我构建与他人构建——以《浮生六记》两个英译本为例”(2024YJSS007)研究成果。

#### [参考文献]

[1]Black S.M. Chapters from a Floating Life[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2]黎土旺.文化取向与翻译策略——《浮生六记》两个英译本之比较[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7,(07):53-55.

[3]沈复.浮生六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4]沈复.浮生六记[M].林语堂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5]王友贵.意识形态与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1899-1979)

[J].中国翻译,2003,(05):13-17.

[6]于平.国家文化形象建构的自觉、自信和自强[J].艺术百家,2011,27(05):32-35.

#### 作者简介:

王千慧(2000--),女,汉族,河北保定人,天津外国语大学2023级英语语言文学研究生,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